

西征红军播下的革命火种（上）

——1936年10月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成立

宁夏，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红军三大主力长征的会师地。红军进入宁夏后，积极开展相关工作，帮助当地百姓实现了民族事务自主。

发出宣告 主张回民自治

1936年5月18日，为了巩固和发展陕甘根据地，争取西北抗日力量的联合，根据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以红一方面军的红一军团、红十五军团和红八十一师、骑兵团等1.3万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进行西征，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西征部队先以红一军团为左路，经吴起镇向陇东进攻；红十五军团等部为右路，由延川王家坪出发，经安塞，出击三边（即靖边、定边、安边）；后来又以红二十八军、红八十一师、骑兵团为中路，于5月下旬至6月上旬相继出发。

西征部队所到的甘、宁两省回族聚居区，当时，在国民党军阀的压

迫下，百姓生活悲惨至极。据1934年《宁夏省政府公报》记载，开列的捐税项目有30余种，如：销售税、家畜税、用盐税、屠宰税、礼仪税、婚税、蔬菜税等。实际征税时，百姓还要在捐税之外，再缴纳其他杂款。苛捐杂税使得百姓苦不堪言，有一首顺口溜言道：“马鸿逵，是坏蛋，他把百姓害得惨。又派粮，又派款，刮去咱们的血和汗。人头税，羊头税，上得人人都反对。”

5月25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出《对回族人民的宣言》宣告：主张回民自己的事情，回民自己解决；保护清真寺，担保回民信仰的绝对自由；联合回族中一切武装力量，成立“回民抗日军”；取消军阀官僚民团的一切苛捐杂税，改善回民的生活；保护回文，发展回民的文化教育；回汉两大民族亲密地联合起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与汉奸卖国贼。

6月底，红军西方野战军解放豫旺县（今同心县）后，还解放了

海原县的回民聚居区兴隆、高崖、李旺、关桥等乡镇，和豫旺县的同心、窑山、王团、羊路、吊堡子连成一片。至7月底，三路红军开辟了纵横400余里的新根据地，并与陕甘老根据地连成一片，给国民党军阀马鸿逵等人的军队以沉重打击。红军和地方武装都得到发展。从8月开始，西方野战军在巩固新区的同时，继续发展胜利，并为迎接红二方面、红四方面军北上创造有利条件。

回汉同心 自治政府成立

1936年8月，建立豫海县回民自治政府的条件基本成熟，中共中央派中共陕甘宁省委书记兼军事部政治委员李富春从河连湾赶赴同心城开展筹备工作，并成立筹备委员会。同月，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与美国医生乔治·海德姆在翻译黄华的陪同下，辗转来到西方野战军总部和红一军团司令部驻地——宁夏豫旺堡（今同心县预旺镇）访

问。在宁夏期间，斯诺对彭德怀等红军将领进行了采访，后来以此为部分素材撰写了《西行漫记》（又名《红星照耀中国》），使之成为西方社会了解红军、了解中国共产党和了解中国社会的窗口。

经过两个月的紧张准备，筹备委员会起草了自治政府有关文件，拟定了代表大会议程，同时给党中央、全国各团体、各路红军发出了关于《召集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的通电》。中共中央机关报《红色中华》一版将此通电全文刊登。

10月20日，陕甘宁省豫海县回民自治代表大会在同心清真大寺举行，来自各区、乡的回、汉代表和各界人士共300多人出席。这一天，古老的同心城里，锣鼓喧天，红旗招展。“胡琴拉起来，唱一个苏维埃，苏区的地方人人爱，看见么，苏区的人民好自在，一切剥削都打倒，生活多痛快。”这是当地回、汉族人民的肺腑之声，他们边唱边跳，表达出对苏区的无限热爱和获得自由的兴奋之情。（据《中国档案报》）

银川老城的影剧院（上）

银川老城上世纪曾经有5所影剧院，分别是红旗剧院、银川剧院、人民电影院、东方红剧院和湖滨电影院。五座影剧院犹如五朵金花，盛开在银川发展的天幕里，承载着不同时期的银川记忆。影剧院有个共同特点，坡形场地，从前台到大门口，一溜上坡，门面形成高大多层台阶，给人一种高高在上的感觉。曾经辉煌的“五朵金花”影剧院，如今花谢花落，沉入历史的长河中。

银川剧院

位于新华购物东侧的银川剧院，曾是银川影剧院中最具代表性的建筑。1927年，由宁夏道改为宁夏行政区的民政厅厅长郎遇芝，将位于新华街的清代吕公祠改建为剧院。宁夏省成立后，省主席吉鸿昌题词为“人民会堂”。人民会堂坐南朝北，舞台高一米三，台口宽十几米，进深约八米。舞台前围有高半米的勾栏，舞台两侧延伸至门口有带廊的包厢，比池内高出一米。池内可容纳千人，后楼为散座。1933年马鸿逵出任宁夏省主席后，将人民会堂改名为“振声舞台”。1935年后，成为宁夏秦腔班子党民学社长期

演出的场所，老百姓俗称“大戏园子”。为什么叫“大戏园子”呢？因为在现在银川南城北门对面的苏宁电器的位置，有个说书的场所，老百姓称之为“小戏园子”。上世纪60年代以曲艺演出为主“小戏园子”，才退出历史的舞台。1958年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大戏园子”拆除。在原址新建了苏联建筑师指导的欧式风格的银川剧院，成为银川市电影放映，戏曲、话剧演出的主要场所。银川剧院矗立在高高的台阶上，有着罗马式的大圆柱，特别气派，是自治区成立时十大标志性建筑之一。2010年，银川剧院被拆除了。虽然流连在这里的老银川人，有惋惜的，有感叹的，可谁又能挡住老剧院消失的步伐呢？

记得文革期间，国产电影先后遭到批判，渐渐停止了放映。老百姓对电影市场的萧条，编成了顺口溜，“东欧（阿尔巴尼亚、罗马尼亚、南斯拉夫）电影搂搂抱抱；朝鲜电影，哭哭笑笑；越南电影，飞机大炮；中国电影，新闻简报。”有一年春节上演朝鲜电影《卖花姑娘》，人们早上6点多就去排队买电影票了。当时票很难买，需要托人情，找关系买电影票，现在听着都可笑。那时是电影的枯萎期，

社会主义阵营的外国新片很受欢迎。谁要是有关系买到了票，谁就会在亲朋好友群里很有面子。那时看电影不仅是生活的享受，更是一种社会能力的体现。大年初一看完《卖花姑娘》，哭得眼睛红肿，吃不下过年饺子的人，也大有人在。

红旗剧院

位于解放西街银川市中医院东侧的红旗剧院，1958年成立，隶属宁夏文化厅。从正面看是二层楼，门面像一面旗帜，设施一流，有红皮座椅，有乐队演奏的乐池，西侧是贵宾厅，有休息室，很现代化，即使放到现在亦不显落后。1958年10月，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在银川红旗剧院举行。当时开会的代表约200人，选举刘格平为宁夏回族自治区主席，马玉槐、吴生秀、王金璋、马腾骧等为副主席，宣告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的成立。从此，红旗剧院成为宁夏政治活动中心之一，相当于现在的宁夏人民会堂。那时的自治区党委在解放西街原公安厅之处，自治区人委（政府）在对面的现“怡园”微公园所在地，加之自治区第一招待所（交际处）在公园街口，自治区很

多大型会议放在红旗剧院召开，非常方便。全国性以及区内外各类艺术表演团体的演出，首选多为红旗剧院。放映各种中外影片，红旗剧院也是敢为人先的。剧院西侧的两层小楼与剧院一体，门前距街较远，十分宽敞，给人们留下高端大气的深刻印象。1994年红旗剧院被认定为危险建筑而停业，1997年剧院建筑被拆除。

2010年自治区文化厅牵头将红旗剧院与宁夏京剧团、宁夏歌舞团的土地房产资源整合，通过市场方式与宁夏银基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联合开发。在银川市解放街原红旗剧院旧址，动工兴建宁夏“红旗文化大厦”。新建的“红旗文化大厦”建筑面积2.3万平方米，大厦共19层，总高99.8米，是一座集演出、排练、办公和文化服务于一体的综合型、开放型、现代化的文化大厦。包括两个剧院、八个排练厅，还能满足3家文化单位的整体迁入需求。红旗文化大厦为首府银川再添一座地标性建筑的同时，在改善宁夏文化基础条件，扩大公共文化服务，推动自治区文化繁荣发展方面将发挥重要作用。（据银川党史网）

回忆宁夏警官职业学院峥嵘岁月

杜茂筠 口述 王 臻 苏 睿 李峻浩 整理

1958年秋，我和爱人王希仁从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法学专业毕业。我老家在四川内江，希仁老家在山西临汾，时值宁夏回族自治区成立不久，需要大批建设者，我们响应祖国建设大西北的号召，自愿报名来到宁夏，从此与宁夏结下不解之缘。

满腔热情扎根宁夏

来到宁夏后，组织分配我们到陶乐县工作。陶乐县东边是毛乌素沙漠，西边面临黄河，是宁夏人口最少面积最小，没有工业基础的农业小县，南北仅各有一条公路通向外面。冬春时节，沙尘暴经常遮天蔽日，夜里怒吼的风声让人害怕。生活用水全部来自浅层水井，喝的水中常有泥沙沉淀，在水土不服的情况下，思乡之情更加强烈。北方的干燥大风让我时常想起故乡的温和湿润。

“滔滔黄河水，漫漫黄沙路。”诗中描绘的远方竟是这般人烟稀少，满目荒凉，但我和希仁没有被艰苦的生活条件和工作环境吓倒，反而让我们得到了磨砺锻炼。我们一心扑在工作小上，怀着满腔热情，就像戈壁滩上的小草，将根深深地扎在了这片土地上。从1958年到1980年，我们在陶乐县坚守了22年。我先后曾在陶乐县政府及教育系统工作，希仁先后曾在陶乐县中学及陶乐县法院担任校长和院长。

攻克坚坚建设学校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转眼间到了1980年，正值国家改革开放之际，整个社会生机盎然，为了解决全区政法干部人才短缺问题，自治区党委举办政法干部培训班，此举为宁夏政法干部学校的成立奠定了基础。后经

自治区编委研究，并报请自治区党委批准，成立宁夏政法干部学校，隶属司法厅管理。我和希仁听从组织安排成为宁夏政法干部学校的一员。我重拾专业，开始了自己的政法教育培训事业。1982年，希仁被任命为宁夏政法干部学校主管教学的常务校长，“教学”成为我们生活的主题词。

建校初期，办学条件非常艰苦，与陶乐县条件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那时的学校建在银川市西夏区新城西花园橡胶厂旁的国防办废弃的炸药厂区内，校园破旧，交通不便。在占地不足7亩的院子里，建起了两排平房。教职工的办公室仅有两三平方米，师生总人数不足60人，9间陈旧的校舍内摆放着旧课桌。简易的操场和校园的土路，晴天尘土飞扬，雨天一片泥泞。不管教学条件如何差，好在学校终于有了固定的校址。在这样的环境下，全校上下无人叫苦无人抱怨，越是困难越向前，努力建设自己的学校。

1987年宁夏政法干部学校更名为宁夏法律学校，1999年更名为宁夏司法警官学校，由一所普通的中专学校转变为警察学校。2002年9月，学校升格为宁夏司法警官职业学院，跻身高等教育行列。我和希仁虽已退休，但得知喜讯后欢欣鼓舞，内心的喜悦难以自抑。此后，听闻学院整体搬迁，以优异成绩顺利通过教育部教学质量评估，成为全国政法干警招录体制改革首批试点院校，心里由衷高兴。2017年，学院划归自治区公安厅管理，正式更名为宁夏警官职业学院。我翻看从前的照片，告诉去世的希仁这一好消息。

全心全意教书育人

作为一名老师，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前提是不断提升自己。为了培

养合格的政法人才，我如饥似渴地学习新知识新理论。我和希仁先后在《法学》《政治与法律》《宁夏社会科学》《内蒙古社会科学》《青海社会科学》《河北法学》等专业学术期刊上发表了“评维辛斯基的证据观”“论过失犯罪的两个阶段”“论被害人陈述”等学术论文，记录我们对专业领域的研究和思考。那时候，我和希仁探讨最多的是教学建设与学术研究，总想着把学问做得更扎实一些，把课讲得更好一些，让学生学得更多一些。

为加强劳改干警教育的培训工作，1981年3月在宁夏政法干部学校成立了宁夏劳改干警教育培训中心。同年5月，自治区党委组织部牵头成立领导小组，抽调学校教职工23人，分设4处教学点，对宁夏军区、兰州军区的空军47师等456名军职以下的转业空军进行为期7个月的法律专业培训，这是学校首次对外培训，为今后的培训工作积累了经验。我和希仁都被抽调为培训授课讲师，我们用心备课，认真讲课，用专业知识回应那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受到培训学员的一致好评。

1982年8月宁夏政法干部学校首次招收高中中专司法班。1983年在宁夏政法干部学校的基础上成立了宁夏司法学校。1984年首届毕业生走向了工作岗位。这些学生顺利走向工作岗位具有里程碑意义，这是学校艰苦办学结出的硕果。因工作业绩突出，1988年我荣获自治区司法厅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党务工作者，2009年荣获自治区司法系统30周年特殊贡献人物称号，这既是对我的鼓励，也是对我的鞭策。我所教过的学生，大部分已是单位的中坚力量，在各自领域成绩突出，令人欣慰。学院永远不会忘记我们，2020

年我荣获建校40周年建设发展模范奖，时任自治区副主席杨东为我颁奖，虽是暮年，仍是激动不已。

服务社会不忘初心

1983年，我和希仁一起成为宁夏回族自治区第一批执业律师。20世纪80年代初至90年代末，社会变化非常快，人们的法治意识比较淡薄，各领域犯罪现象比较突出。因此我专攻刑事法律，希望用自己的专业知识服务社会，为社会的公平正义贡献绵薄之力。服务社会让我紧跟时代的步伐，极大地丰富教学资源，又反哺了教学。教学之余，我积极参加社会实践，代理了大量的刑事辩护案件，为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据理力争，赢得了政法系统的普遍认可。2018年我荣获自治区律师协会30周年特殊贡献奖，2020年我荣获银川市律师协会行业特殊贡献奖，2022年荣获宁夏法学会资深法学家荣誉称号。

抚今追昔，我和希仁的大半生都在宁夏这片热土上度过。希仁2016年去世，我也进入耄耋之年。人生过往经历在记忆里逐渐模糊，许多事情已想不起来，但建设学校、教书育人、服务社会的印迹始终深深刻在脑海中，历久弥新、历久弥坚。

（杜茂筠，生于1931年，宁夏警官职业学院高级讲师，教授，原学院刑事法律教研室主任，自治区著名律师。王希仁，生于1933年，原宁夏政法干部学校、宁夏司法学校校长，宁夏社会科学学院法所所长、研究员、法学家、律师，中国诉讼法研究会名誉干事、中国法学会个人会员、宁夏法学会理事、宁夏律师协会理事、宁夏民法经济法研究会会长。）

移民岁月

第一百二十七期

YI MIN SUI YUE

王志洪:把文化“大篷车”开进千家万户（四）

王志洪：在芦花台的那场演出真是教训深刻，场面极其尴尬，看我们演出的人还不如看耍猴的人多。耍猴的摊子一会传出一阵笑声，而我们这边真的是一会招来一顿骂。要说还真是农民教育了我们，从那以后，我们放弃了原来的路子，开始重新创作我们的节目，写农民的生活，演农民的戏。就是到生活中，体验农村的人和事，到乡下去，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与农民交朋友，了解他们的情感，抓住农村生活中的热点问题，围绕农村、农民和农业发展中的生活写剧本、搞创作。最初写出的戏与农民实际生活有距离，农民说看着不像，后来我们就尝试把写出的戏排出来，先请农民代表来看，让他们挑挑鼻子竖挑眼，这个办法太有效了，按农民意见修改后的戏对农民的胃口，戏路子就是说农村的事，讲农民的话，评乡间的理。

刚开始的大篷车特别简陋。一辆大卡车加个帆布篷，服装、道具、演员全挤到车上，到了演出地方，两边的车挡板支平，就是舞台，农民的晒粮场、村头的空闲地、山区的大土坡、只要能停下车，能坐下观众就行。由于演出的剧目贴近了农民，大篷车很快被农民接受，并一下子火爆了起来，欢迎程度远超出预期。很多演员的艺术情结重新被点燃，演出一场接一场，邀请到各乡镇演出的信函应接不暇，有的村队农民看了戏后不愿散去，只好再为农民观众唱几首流行歌曲。

王志洪：1985年的冬天，我们到隆德县的一个村子送戏，本来计划的场次已经完成了，可大雪封了路，车动不了，大家全住在老乡的家里。来回回地有农民问，你们下一场哪天开演，反正大伙也闲着没事，大家一商量，加场吧，没想到，四里八乡有上千人赶来看我们的戏，可能是提前通知了吧，那天演出时雪下得挺大，可农民看戏时一动不动，小孩都趴在车边，雪落到身上厚厚的二层，那天的场景太让我们感动了，所有的演职员都被感动了，那时候我们才真正明白，农民的文化饥渴已有多深、才真正领悟到了农村的演出市场有多大、农民对文化的需求有多么强烈。那天的演出是演员发挥最好的一场，结束后农民还围着不散，谢了两次幕，又加了两段清唱，收摊时很多农民还帮助我们收拾道具装车。回到住地后，大伙兴奋得睡不着觉，喝酒、聊天，按

捺不住的激情，都有种绝处逢生的感觉。有位老演员举着酒杯动情地说：话剧不死、艺术永存，让我们为走遍农村千杯。真的是既豪迈又悲情，特高兴、又特伤心。

那天的演出还激发了王志洪新的灵感，就是在戏中加入方言，不仅舞台上演出的故事情节要贴近农民，台词和表演方式也向群众的真实生活靠拢。有几台戏还根据剧情发展，设计过演员从观众席里走上舞台，缩小舞台与观众的距离。

在剧本的创作中，他们还在戏剧冲突高潮或喜剧色彩浓烈的桥段里全部使用方言。强化亲近感。于是全团演员又开始学起了方言，转场途中，演员在车上练方言。中卫话、固原话、盐池话、普通话，声声悦耳弥漫车厢，什么时候用什么方言全看剧情发展和不同的演出地域。用方言强化剧情的办法收到意外的效果。王志洪说：方言成了话剧大篷车演出不可缺少的舞台道具。

王志洪：被惨淡的城市市场逼出来的话剧大篷车一下子火遍宁夏山川，也应了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的老话。就这么着，我们的大篷车演出从第一次试着走到现在已经36年了，这是我们在夹缝中找到的一条新路，城市没了市场我们可以到农村去，到了农村才知道中国的农村市场有多大、群众喜欢程度有多高。我也分析过大篷车能够火起来的原因：一个是电视里农民喜欢的节目不多，少得可怜的农村戏又多是空中楼阁，离农民的现实生活距离太远，另外一个是我们的戏都写农民的生活和农民身边的事，所以我说：宁夏话剧团的大篷车是选对了方向又走对路，也使我们从开始的走街串巷变成了后来的四面八方，走向全国。为了方便农民看戏，我们还坚持演出的地点由农民定，演出的时间由农民定，演出的季节随农忙农闲走，乡村的田间地头、农民的集贸市场、村口学校、村委会驻地，有时也会在山坡和路边演，真的是树立起了服务农民的思想，也把话剧艺术的根给留住了。

把根留住，把文化和笑声送到农民身边讲起来好讲，但做起来又需要全体演职员的精耕细作，千回百转、千锤百炼。最难的是演出的剧情故事要贴近农民，走进他们的心里。这时候的王志洪不仅要演话剧，导话剧，还要写话剧。

（拜学英 蔺银生 撰稿）

宁夏近代工业（下）

制药业。先后设立了裕宁甘草公司、利宁甘草膏制造厂、宁夏卫生材料厂等企业。1933年初，马鸿逵令宁夏省建设厅厅长魏鸿发在洪广营创办裕宁甘草公司，该公司产品只有两种：一种是选粗壮的甘草，切削整齐，装扎一捆，运往外省销售；另一种是熬成药膏出售。全公司有工人四五十名。1939年底，裕宁甘草公司停产。1940年4月，马鸿逵又令宁夏省银行附设的富宁商行利用私人股金40万元和原裕宁甘草公司旧有设备，建成利宁甘草膏制造厂，并将厂址由洪广营迁至宁夏城北郊八里桥。约有工人70名。产品为宁夏甘草熬制的“双鹿”牌甘草膏，年产量达14.4万磅，主要行销西安、兰州等城市各医院，少量精品送重庆国民政府财政部下属外贸公司销往国外，换取外汇。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因市场停滞，该厂被迫于1942年8月停产。

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宁夏省内工业生产原料如钢铁、动力燃料等也同样紧缺，机器设备维修困难，为解决这些问题，宁夏省政府先后办起几家类似重工企业的企业。

电力业。1935年10月，宁夏省银行和商商会投资10万元，在宁夏城东南隅建起宁夏电灯公司。该公司属官商合办性质，以马鸿逵为董事长，先后购置当年慈禧太后用过的发电机，动力蒸汽机等共7台，日发电量1200多度，主要供应马鸿逵公馆及省会军政官员照明用电。由于该电厂设备陈旧，时常停电，因而向城内工厂企业输送电力很少，当时曾时时断续向宁夏印刷厂等企业供电。公司内部没有系统的经营管理机构。所以，无论在生产手段上，还是在人员构成和组织管理上，电灯公司

都可以说是最具近代特点的企业，因而也是宁夏近代工业的标志。

炼铁和机器修理业。1943年2月，马鸿逵及其幕僚筹集股金300万元，成立兰鑫炼铁公司，马鸿逵自任董事长。该公司下设大武口、汝箕沟等炼铁厂，有工人近300名，也曾派较多的士兵参加生产。该公司采用土法炼铁，产品多为铁锹、铁锅、镰头、菜刀、镰刀、军用铁锅等生产、生活用品。为利用炼铁材料获利，1944年，马鸿逵女婿太刘慕侠等，以已停产的宁达棉铁厂铁工部为基础，筹资建起兰鑫机器厂，除为宁夏电灯公司、造纸厂等企业维修小型机器外，只能生产铁锅、铁锹、火炉等铁制品，产品却销路不畅。

化工业。先后成立立达盐碱公司、绥宁动力酒精厂等企业。其中，绥宁动力酒精厂于1942年由马鸿逵和傅作义各筹资40万元联合建成，厂址设在杨和堡（今永宁县境内）。该厂利用简陋的设备制造酒精，以补充汽油之不足。该厂投产，“日出酒精三四千加仑”。

综观宁夏近代工业，绝大多数集中在宁夏省城，从马鸿逵主政宁夏到抗战前期为初步发展阶段，抗日战争时期因宁夏没有受到日本帝国主义侵占而处于鼎盛阶段，以后因内战的爆发和官僚资本的介入与垄断而走向衰落。在鼎盛阶段，宁夏近代工业的特点是数量增多，范围拓展，规模扩大。当然，这些企业尽管有一定的市场需求和初步发展，但其生产发展水平极低，产品种类有限，加上投资少，资金短缺，机器设备缺乏，生产规模小，这些客观因素又直接限制了这些地方工业的发展，从中反映了宁夏近代工业的初级性和封闭性。

（据《历史银川》）